

神學的位置：教會還是大學？

大衛·弗格森 (David Fergusson) 劍橋大學

1. 介紹

當今基督教神學所展開的場域極為多樣，因此，對於其存在的根據與意義，並不存在一個簡單的答案。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將會隨著問題所處的具體語境而有所不同。自歐洲古老大學創立以來，神學便一直在其中被教授，這一事實反映了「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的時代特征——無論是在宗教改革之前還是之後。十六世紀最早設立的講席，往往就是神學講席。然而，即便在這一點上，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一些顯著差異，例如德國、斯堪的納維亞以及英國之間的差別。在一個地方看來是合理的事情，在另一個地方卻可能顯得不合常規。即使在英國國內，也存在重要的差異。如果我們再將視野擴展到當今世界基督教的多樣性，這些差異就更加明顯了。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先探討這一歷史背景，然後再考慮當代關於神學是否應存在於公立大學中的正反論證。儘管我將在結尾處討論更廣泛的全球處境，但我也意識到，這種討論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我個人的學術經歷與處境。對於國際讀者而言，這些假設可能會顯得帶有某種地方性。

儘管基督教神學常常是在歐洲的大學中被從事的，但這從來不是它唯一的場域。神學院、修道院、宗教團體、牧師住所以及教區住宅，都曾是這一學科作出重要貢獻的所在。我們應當警惕一種假設：認為如果沒有大學這一歸屬，神學就無法興盛。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線上與遠程學習項目的興起，這種多樣性反而可能正在增加。神學研究的這些場所是多樣的，而其所依托的媒介也同樣在發生變化。

在耶魯的 David Kelsey 曾指出，當代神學教育的模式，需要在古代的「教化」(paideia，即一種人格與生命的培育體系) 與現代職業訓練範式（例如法律或醫學）之間進行調適與協商。當我們考察當代大學時，這兩種模式都因相關的原因而顯得成問題。學術機構已經不再是一個培育宗教或屬靈身份的場所。人們期待學生在多個學科領域中展現其學術能力，而不是展示其屬靈生命的發展。這裏不存在任何告白性的測驗，也沒有宗教培育方面的要求；事實上，許多學生在開始與結束學業時，都未曾認同任何宗教信仰。與此同時，神學學位課程吸引了大量並無意尋求按立的學生。並不存在一條單一的職業或專業路徑。雖然其中有

些人可能、也確實會在事工任務上得到更好的塑造，但這一點不能被假定為適用於所有學生，甚至不適用於大多數學生。

在一個宗教逐漸衰落的社會語境中，我們常常會聽到關於神學研究「相關性」的質疑，這些質疑往往來自其他學科的支持者。然而，在近期的討論中，「相關性」這一概念本身也引發了不少反感。很少有人會被一個對自身未來感到焦慮的學科所吸引；同樣，也很少有人會被一個不斷為自身「是否相關」而憂慮、且對自身定位缺乏確定性的學科所說服，從而選擇去學習它。Nicholas Wolterstorff 曾批評那種「適應性策略」。他寫道：「神學家環顧當代學術界，尋找那些普遍受到推崇的發展方向，然後試圖在這些旗幟之下，夾帶著一點神學前行。」有時，這種做法導致神學家追隨哲學中的知識潮流，希望借此獲得某種學術上的正當性。作為一位哲學家，Wolterstorff 對此深表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缺乏勇氣的表現，也是對神學所歸屬之信仰共同體責任的失職。另一方面，他也反對那種帶有保護主義傾向的策略，因為這種策略往往使神學與外界隔絕，從而失去與文化主流互動的能力。基於這些原因，我們看到中國學者楊慧林的論述令人鼓舞：他認為，即便是在世俗且非告白性的環境中，神學仍然能夠為大學所面臨的關於「意義」的根本問題提供資源。「在某些時刻，當神學意識觸及其終極形態時，人文學科的精髓反而會更加充分地顯現出來。」

在下文中，我將假定：在當代歐洲語境中，針對在學術界繼續從事基督教神學研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大體上是相似的，儘管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一些差異。這些反對意見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大體上屬於世俗且持懷疑態度的立場，另一方面則是教會性（ecclesial）且具有告白性質（confessional）的立場。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我將分別對這兩類立場作出回應；與此同時，在中間部分，我也將提出一種較少防禦性的路徑，以說明神學能夠為大學提供什麼。

2. 世俗懷疑論

一種時常被提出的立場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信仰在法律之下都被平等對待。納稅人資助高等教育，並不是為了推動任何單一宗教的事業。因此，在學術機構中從事一種具有告白性質的神學，實際上等同於違反了與資助機構之間的某種契約。還可以提出其他一些考量來支持這一立場。這些包括：歐洲社會日益加深的世俗化，在某些地區，參加教會的人數已低至 2%。考慮到信徒的年齡結構，這一比例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只會朝一

個方向發展（即持續下降）。這引發了一種不安，尤其是在那些歷史悠久、一直設有基督教神學教學的大學之中。神學突然顯得不再是這個學術版圖中熟悉且自然的一部分。在一個以基督教為主的社會中，它在大學中的存在曾經顯得毫不突兀；但如今，這已不再是默認選項，因此它的存在需要被謹慎地加以論證。我們是否已經在自己的房子裏成為了陌生人——那些曾經的主人，如今卻被當作令人尷尬的房客？

為什麼還要繼續從事基督教神學的教學與研究？對此問題的一個回答是簡單的，儘管在某種程度上也帶有工具主義色彩：只要仍然有人希望學習基督教神學，它就會在大學中繼續存在並發展。當今英國神學領域一個頗具悖論性的特征在於：即使我們周圍的教會不斷空置與關閉，學習這一學科並從事教學的人數，卻比「基督教世界鼎盛時期」還要更多。對此現象，或許可以提出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儘管基督教信仰在歐洲（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正在迅速衰退，但在世界其他地區卻在蓬勃發展，因此確保了一個國際性的學生群體，特別是在我們的研究生項目中。在一個日益世俗化的社會中，我們或許很容易忘記：世界人口中約有 85% 的人仍然信奉某一種宗教。從全球範圍來看，世俗化並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它更像是一種區域性現象，主要出現在昔日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區。

第二種解釋，尤其適用於我們的本科與碩士課程，可能在於一種知識性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已不再受到必須遵循教會正統標準之期待的束縛。儘管在大學生活中，智識上的輕蔑與冷漠並未完全消失，但它們正逐漸被困惑、驚訝，甚至某種程度的欣賞所取代。宗教所提出的問題、它曾給出的回答、其經典文本、其社會影響以及其歷史重要性——這些在今日仍然吸引著學生的興趣。此外，如果關於屬靈意義與宗教真理的問題在其他學科中浮現出來，那麼學生就會轉而進入神學的學習領域。許多人正是在「從其他學科轉向」的過程中進入這一學科的。

這就引導我們進入一種更具實質性的回應。如果神學關涉的是那些我們所面對的最為根本的問題，那麼將它排除在學術生活之外，反而會令人感到驚訝。為什麼會有「存在」，而不是「虛無」？我們為何在這裏？人是什麼？從那些悠久的屬靈傳統及其經典文本中，可以汲取怎樣的智慧？什麼樣的人生才值得去過？科學為何如此成功？又或者借用 Dietrich Bonhoeffer 那句常被引用的問題：對於

我們今天而言，耶穌基督是誰？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將我們帶入哲學與神學的邊界地帶。在前文提到的楊慧林的文章中，真理、道德與美的問題被視為正在侵入神學所占據的領域。「藝術與人類的終極相遇以及自我救贖相溝通，在這一過程中，它表達了人類屬靈渴望的深度。」

在當今更為世俗的語境中，藝術常常能夠成為通向神學的一扇入口。事實上，根據我近年來在劍橋的經驗，許多學生正是出於其審美關切而走向神學研究。儘管「超越性」(transcendence) 這一概念常常顯得難以把握，但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我們需要一套語言，用以描述一種超越物質性與功能性層面的經驗領域。一首歌曲或一幅畫，能夠將我們從日常生活的瑣碎關切中提升出來。Iris Murdoch 曾寫到，一只盤旋的紅隼如何突然將她從當下的自我專注中提升出來：

「我正以一種焦慮而怨憤的心境望向窗外，對周圍環境渾然不覺，也許正反復思索某種損害了我聲望的事情。忽然之間，我看見了一只盤旋的紅隼。就在一瞬間，一切都改變了。那個沈溺於自我、帶著受傷虛榮的自我消失了。」

同樣地，當我們置身於山坡之上，或在開闊的鄉野中觀看日落時所 *अन्यत्र* 到的那種敬畏之情，也能夠引發一種形而上學的感受——仿佛有某種超越我們自身之上的存在，儘管它又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會以一種全新而令人震動的方式，意識到當下這一刻的重要性。我們的生命呈現出一種嚴肅性，而這種嚴肅性或許是我們曾經遺忘或缺失的。這些「宇宙性顯現的時刻」(moments of cosmic disclosure)，暗示著一個維度——這一維度無法被還原為純粹的物質性或僅僅自然的層面。在這裏，「超越性」的概念與「高度」的語言緊密相連——我們被提升、被擡升，從而去凝視那超越於我們之上的事物。

一種看似形成對比的進路，則是以「深度」與「內在性」的語言來談論上帝。相對於「高度」的語言，在這種表達中，上帝被描述為「存在的根基」，或作為賦予萬物生命的靈。自然世界與藝術同樣能夠喚起這種「深度」的感受。我們被引入對那已經存在之事物的一種更為深刻的領悟——只是我們若能以更大的洞察力去辨識它，就會發現這一切本已在那裏。在這裏，Martin Heidegger 所使用的「揭示」(uncovering) 這一語言似乎更為貼切；同樣，泛在神論 (pantheism) 所采用的意象也十分契合——這種關於上帝的教義強調：神完全內住於萬有之中。

對於基督教關於上帝的理解而言，「超越性」與「內在性」這兩個觀念必須

被視為相互關聯、甚至彼此依存的。猶太教與基督教都通過對「在我們之上的上帝」的強調，強烈地確立了超越性的觀念。上帝居於天上，是崇高而被高舉的。儘管這種表達有時以一種較為樸素的空間性方式呈現，但這種意象似乎對於表達其所涉及的內容是必要的。這種關於上帝「在天上」的描繪貫穿於詩篇以及主禱文之中，從而確立了一個塑造上帝與世界關係的超越性維度。與此同時，這一點也通過關於耶穌升天的信經性信念而得到加強。然而，這位「在我們之上的上帝」，卻是通過「在我們中間之事物」而被啟示出來的。物質世界乃是我們認識上帝不可或缺的場域。我們並不是通過逃離這個世界來尋找上帝；相反，我們是在萬事萬物之中與上帝相遇。換言之，上帝在我們所在之處與我們相遇，而且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臨到我們。由此可見，「超越性」與「內在性」是在區分之中的合一。Dietrich Bonhoeffer 以其反復使用的一個形象生動地表達了這一點——上帝是「在我們中間的彼岸」。上帝並不是在認識論所設定的邊界之處被發現，而是在「村莊的中心」被遇見。

如果我們壓製這種對超越性與神聖的覺知方式，或者甚至拒絕在學術語境中對其加以認真對待，那麼其結果將是視野的收窄，甚至會構成一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對自由探究的限製；然而，這些問題很快又會在其他學科中重新浮現出來。法國哲學家與神秘主義者 Simone Weil 曾將自己描述為處於教會與世界之間的一個邊界位置。她指出，有關我們自身、世界、上帝、苦難與愛的諸多問題，是彼此深深交織在一起的。這些問題並不存在現成的答案，但在對它們的追尋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引入神學的領域。在學術語境中壓製或擱置這些最深層的存在性問題，只會導致一種懶惰式的逃避。

3. 邁向神學對話

神學並不能單獨回答這些問題。它必須在與其他進路、探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的對話中前行。這也正是為什麼，將神學與聖經批評、教會歷史以及宗教研究並置在一起，儘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張力，卻仍然能夠良好地運作。我們的大多數前輩都會認為這本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他們甚至可能難以理解當今學術界這種分工明確、邊界清晰、各自成「行會」的結構。在其最佳狀態下，神學與其他學科並肩運作——既不屈從於知識潮流的附庸地位，也不以專斷的姿態居於支配地位。如果說後者（專斷式主導）曾在過去帶來問題，那麼前者（盲目追隨）在當今或許才是更大的危險。

這些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並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被逆轉。多樣性與差異性被視為在智識上具有豐富性、在社會上具有包容性，並且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與世界。我歡迎這些發展，因為它們在我自己的學術生涯中帶來了刺激與思想上的自由。我們也可以註意到，在一個多學科的語境中攻讀基督教神學學位，能夠培養出與最優秀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項目相伴隨的各種能力——包括語言能力、歷史理解、哲學思辨、文學分析以及社會科學的方法。作為可遷移的能力，這些素養是在神學與宗教研究的學位課程中逐步形成的。

神學是否應當是一項具有告白性質的事業？答案是肯定的，但這種告白性不應以黨派化或宗派化的精神來體現。神學家的判斷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其自身的告白性立場，然而這些立場必須向質疑、修正與調整保持開放。我們歷經數個世紀的神學講席歷史表明：神學是流動的。它並不僅僅是對十三世紀、十七世紀或二十世紀所完成之工作的簡單重複、闡釋或復原。對傳統過往表達的質詢是必要的。如果神學失去了其歷史維度，以及對一個「活生生、正在呼吸的傳統」的表達努力，它就會迅速滑入一種更為抽象的宗教哲學之中。神學始終不斷地回到其學科的經典文本之中，因為它確信這些文本能夠照亮當下。然而，這種與過去的對話始終既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設性的。我們當中很少有人仍然完全認同過去關於預定論、地獄、他宗教、異端鎮壓、人類起源以及聖經無誤性的所有教導。與此同時，鑒於如今大多數基督徒生活在西方之外，基督教神學內部的多樣性，或許從未像今天這樣豐富。

神學研究使我們不可避免地進入一種「規範性」的承諾之中。不存在一個類似阿基米德支點那樣的中立立場。每一種立場——包括無神論、懷疑主義以及自然主義——都承載著關於上帝、屬靈性、宗教、世界以及人類存在的規範性判斷。神學會提出評估性的評論，並且會作出真理性的主張，即便是在其最具解構性的形態中也是如此。如果神學無法做到這一點，它很快就會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對當代受眾的吸引力。或許會有批評者主張，我們應當將自己局限於基督教思想史的研究，但這種立場本身也隱含著某種規範性判斷，同時也回避了那些最重大的問題。如果在課程體系中包含 Augustine、Thomas Aquinas 以及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的思想研究，卻在實際上認為：如果他們今天申請我們大學的教職，我們會因為他們所持的告白性主張而拒絕錄用他們——這顯然是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

在跟隨耶穌的過程中，基督徒被委身於在一切可以找到之處尋求真理，尋求那遍及世界各處的「邏各斯」(logos)。Simone Weil 寫道：「如果一個人是出於對真理純粹的關注，那麼他與上帝的搏鬥永遠不可能過多。基督願意我們在他之上更偏愛真理，因為既然他是基督，他就是真理。若有人離開他，轉而走向真理，那麼他還未走多遠，便會落入他的懷抱之中。」

4. 基督教神學是否應該獨享特權

在這裏，一個顯而易見的反對意見已經浮現在你心中：為什麼在任何一所大學中，要對基督教神學的研究賦予優先地位？對此問題唯一可以給出的回答，大致仍然沿著先前所提出的思路展開：如果持續存在某種需求，那麼在適當條件之下，提供這種供給的理由也就依然成立。然而，我們也能夠、並且應當承認：西方社會的宗教特征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同的神學與世界觀——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其他傳統——都應當在我們的大學中獲得表達。基督教神學的聲音，將越來越需要在與其他規範性立場的對話中被聆聽——這既是必要的，也是令人興奮的前景。在未來，教會對自身的理解，將不得被置於一個多信仰的語境之中，而不再是單一信仰的孤立狀態。在西方之外的國家與文化中的基督徒，往往在這方面準備得更為充分，我也預期他們將在本世紀這些比較性研究項目中發揮重要作用。

將神學研究納入大學的另一個理由在於：它在任何神學院或神學系中，都是一個具有必要凝聚力的要素。究竟是什麼，使我們這些不同的學科不至於各自分離、走向不同的方向——無論是趨向古典學、歷史學、哲學、文學，還是社會科學？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這些領域中找到自己的歸屬；事實上，我們在這些研究領域中也已經擁有許多重要的對話夥伴。那麼，究竟是什麼將我們維系在一起？是否可以說，是一種共同的承諾：去嘗試對人類以及我們所處世界的宗教性自我理解提供某種洞見？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這是一項廣義上的神學事業。它並不要求人們在某一信條、信仰告白或世界觀上達成共識——事實上，如果這些立場之間存在爭論，反而可能更具活力與啟發性——但它確實要求我們致力於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與處境中，去追問那些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問題。

5. 神學能為大學提供什麼？

神學能夠為更廣泛的大學帶來什麼？與其採取一種防禦性的姿態，神學是否能夠毫無羞怯地將自身置於大學生活的中心位置？或許神學在學術界中的嵌入程

度，比表面看來要更深。我們的同事已經在大學中與其他學者展開合作——包括在自然科學、醫療健康、伊斯蘭研究、文學、亞洲研究等領域，當然也包括與古典學、歷史學和哲學的對話。我們在這些交流中帶來了一些獨特的內容，儘管這種潛力未必總是被充分實現。這一學科未來的繁榮，將取決於其不僅能夠與其他信仰傳統的神學展開合作，也能夠與大學中的其他學科建立聯系。當今的研究生需要被鼓勵，不要使自己的學術興趣變得過於狹窄，也不要忽視去了解自身領域之外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某場研究研討會的報告看起來與自己的研究領域無關，就選擇待在家中或圖書館，而不去參與其中。

神學在大學更廣泛的戰略目標中，也具有其獨特的角色，這一點在大學的使命陳述中有所體現。全球可持續發展這一多層面的挑戰，就是神學能夠與其他學科及學術機構共同作出貢獻的一個例子。世界自然基金會在其 2020 年《地球生命力報告》中指出：「迫切需要一種深層的文化與製度性轉變，而我們的文明迄今尚未真正擁抱這一轉變：即邁向一種珍視自然的社會與經濟體系。」如果我們要實現這樣一種「深層的文化轉變」，那麼世界各大宗教必須發揮重要作用——它們需要彼此合作，並與其他機構共同努力，在其信徒當中建立一種強烈的意識：即我們與自然世界、與其他受造物以及與未來世代之間的關聯性。宗教在表達這樣一種規範性觀念方面具有獨特能力，即強調我們對後代的責任，以及我們作為地球暫時管家的角色，這一點早已得到廣泛證明。如果「可持續發展」成為大學的戰略目標之一，那麼在這一進程中，它必然需要與宗教展開互動。創造論的神學在改變我們信仰群體中的觀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這種神學最有效的發展方式，是與其他學科進行密切對話。基督教的創造教義在歷史上一直面臨兩個相關的問題：要麼它僅僅作為救贖教義的前奏或鋪墊存在；要麼它過於以人為中心，集中強調「上帝形象」(imago Dei)。然而，對我們嵌入自然世界之中的處境、對我們與其他受造物共享生存空間的現實，以及對其他生命之重要性的關注，正逐漸通過基層神學思考的推動，促成一種更為擴展性的創造觀。再一次地，當神學置身於大學之中時，它就在學術界與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間建立了有價值的聯系。而在此過程中，它也以其獨特方式推動了當代大學所追求的典型目標之一。

6. 神學能為教會提供什麼？

神學又能為教會提供什麼？這些反思是針對一種可能來自世俗立場的批評者

而提出的。自從我在 20 世紀 70 年代學習哲學以來，我一直認為，世俗主義將會對神學家構成最為熟悉且最具挑戰性的難題。然而，如今我卻從另一個方向察覺到一種威脅——也就是來自教會本身的威脅。對於傳統神學教育模式的焦慮正被強烈地感受到，尤其是在按立候選人為了在一個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其早期基督教歸屬的社會中，從事不同形式的事工而接受訓練之際。教會不再只是維系一個已經被基督教化的社會，而是面對一個更加艱難的挑戰：在一個迅速變化的處境中進行宣教性的參與、服事與外展；這一處境的特征是冷漠、製度性歸屬的瓦解，以及人們對基督教信仰的禮儀、實踐與信念的陌生。是否有可能，一種「學徒製」的事工模式會更為有效？在這種模式中，候選人紮根於教區，在其他牧者的陪伴下服事，並通過「脫產日學習」(day-release) 或遠程教育的方式來接受神學訓練？這樣的模式是否能夠培養出更強的韌性，以及一種在大學環境中較難提供的屬靈塑造？我並不否認，在這樣的處境中，對韌性與屬靈塑造的需求更加迫切，也不否認按立訓練確實需要作出調整。在任何形式的牧職培育中，總是可以輕易發現其中的缺失與不相契合之處。然而，將自己置於當代神學各學科的教学與研究之中，並與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學生互動，依然具有明顯的優勢。大學本身可以被視為我們更廣泛社會的一個縮影，而這正是事工需要展開的真實處境。教會可以、也應當通過接觸宗教研究領域中的學術卓越成果而得到豐富與更新。

無論如何，教會始終並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個神學性的群體。這一點構成了它最根本、也是首要的處境。在我們的禱告、聖詩、神聖文本以及規範性實踐之中，蘊含著強烈卻往往是隱含的神學性假設。神學正是在這裏生成的。如果缺乏某種具有明確神學性質的認知性承諾，教會在眾多自願性組織之中，就會失去其獨特的身份。當我們誦讀主禱文、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以及十誡時，我們其實已經深深地進入了神學的領域之中。這些第一層級的神學性承諾，需要通過一種第二層級的神學反思過程而得到反省與豐富；而這種反思，通常是在修道院、神學院、聖經學院以及大學之中展開的。因此，這是一種在信仰告白內部展開的追求，在其中，信仰尋求理解。基於這一點，大學不過是神學得以展開的多個場域之一。它甚至可能並非絕對必要——儘管我仍然主張，它是可取的。

教會若在大範圍內從高等教育領域撤退，就會使神學教育脫離我們文化主流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失去在一個由多種宗教研究路徑所豐富的語境中

學習的諸多優勢。英國前首席拉比 Jonathan Sacks 曾寫道，使有信仰的人免於在錯誤的事物上「信得太深」，這一點至關重要。而在學術界中對神學進行批判性的研究，可以成為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7. 全球神學教育的多樣性

前述論述反映的是一種西方語境，在這一語境中，世俗化進程以及對自由中立性的倡導，已經導致神學在學術界中的地位受到質疑與爭論。這些挑戰也因試圖改革神學教育模式（特別是針對按立候選人及其他教會工作者的培養方式）而進一步加劇，這些改革旨在回應新的宣教性挑戰。然而，西方教會或許可以從世界基督教其他地區的發展趨勢中有所學習，尤其是從中國的經驗中汲取教訓。

教會長期以來一直參與教育的提供。這一傳統早於任何「國家全面提供教育」的理念。這一歷史發展的一個結果，是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的出現，在這些機構中，教義與倫理的研究是課程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一項基礎性的目標，基督徒的生命塑造被牢固地確立下來，並在大學或學院的宣教性使命中占據一個不受質疑的位置。

將學術研究從任何神學內容中加以世俗化的分離，這種做法本身也可以被視為啟蒙運動在西方所產生的一種產物，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抽離式理性」的模式，而這一模式如今本身也已顯得成問題。其他文化對於接受這一西方模式，或對其可能帶來的影響感到憂慮，往往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傾向。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一些表面上屬於世俗性的機構中，仍然出現了對神學研究的開放態度。神學的問題，以及其經典傳統資源，被視為正當的學術研究對象；即便對於教會之外的人而言，它們也具有建設性的潛力。就這一點而言，這種態度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對 Karl Marx 那一觀點的一種隱含批評——即宗教不過是經濟異化的副產物或附帶現象。作為一種更為深度嵌入文化、社會與思想結構中的力量，宗教無法被簡單地歸類為一種在因果上無效的存在。因此，一個「活生生的傳統」的生成性力量在此得到了承認，儘管這種承認仍然帶有批判性的維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既提供了一些優勢，同時也引出了若干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在這種學術語境中對神學的研究，能夠防止這一學科被還原為僅僅是歷史性的或社會科學式的解釋。它的規範性地位可以得到肯定，但這種肯定的方式，並不要求學術研究必須為任何單一傳統或某一告白性群體進行辯護。這種做法的優

勢在於其所具有的合一（ecumenical）潛力。在這裏，神學可以從任何宗派歸屬中被釋放出來，以一種跨告白（trans-confessional）的參與方式展開，從而盡量減少那些自歐洲宗教改革以來一直分裂教會的差異。智慧與真理，應當在一切可以找到它們的地方被追尋。這種學術語境，很可能會因其所提供的學術自由與屬靈自由，而在未來對學生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這些自由與對聖經及傳統的嚴肅研究相結合之時。此外，前文所提到的那一主張——即神學將自身定位於與其他學科及各種知識形態並列——在未來也將繼續對學生具有吸引力，甚至是必要的。近期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大宗教的信徒之中（猶太教除外），基督徒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之一。這一不斷受過良好教育的信徒群體，將會尋求一種神學理解，而這種理解必須與他們在學術界中所接觸到的批判性研究與探究標準相稱。

但是，這種神學研究的模式，是否能夠在缺乏與信仰共同體及其實際生活之間積極關係的情況下得以維持呢？基督教神學不正是一種第二層級的活動嗎？它是建立在教會的禮儀生活、信經傳統以及實踐生活之上的。我仍然強烈傾向於這一觀點。畢竟，那些為學術研究提供資源的偉大神學著作，都是由深深紮根於教會生活之中的思想家所產生的——無論他們是主教、修士，還是教授，是平信徒，還是已受按立的聖職人員。Augustine、Thomas Aquinas、John Calvin、Friedrich Schleiermacher、Karl Barth 以及 Karl Rahner 都對此表達得非常明確。他們每一個人的首要歸屬，都是在教會的生命之中，而只有在其次的意義上，才是在學術界之中。

我們不應低估上帝子民對於神學教育以及有智慧的講道的渴望。耶穌不僅是一位傳講者，也是一位教導者。對宣教的過度強調，可能會遮蔽每一個教會群體內部「教導」這一工作的重大意義。為此，牧者的神學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這將要求一種能力：能夠表明基督教信仰與人們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中所獲得的理解與知識，是彼此一致的。我們教會中的講道者與教導者，不應當在教育程度上低於他們所服事的人群。這並不是神學精英主義——而是關乎在人的真實處境中與他們相遇，並盡我們所能去回應他們的問題。

總而言之，追求基督教神學，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進入那些人類所共同面對、且無法回避之最深層問題的路徑。這些問題深深嵌入於世界各大宗教之中。這種追求一方面將確保學生持續的興趣，另一方面也會培養出一套能力，而這些能力

在適應性方面，並不遜於任何博雅教育所提供的訓練。當神學的研究與教學被置於一個廣泛的學術語境之中時，它能夠與公民社會形成多重具有建設性的聯系。這種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場域中展開——包括學院、神學院以及大學——而這種多樣性的存在應當被肯定與珍視。然而，有一個目標將始終保持不變：那就是理解我們的聖經與傳統，並說明它們如何在上帝的世界中為教會提供意義。